

韩复智 编著

钱穆先生学术年谱

【卷五】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华书局
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
National Compilation of Press

钱穆先生学术年谱

【卷五】

韩复智 编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 戊戌 六十四岁

一 国内大事

“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”，选出一九五七年度院士杨振宁、李政道、吴健雄、潘贯、朱兰成、蒋廷黻、姚从吾、劳干、蒋硕杰等十四人。

“国防部”正式宣布：台湾海峡情况紧张，金、马前线及台湾全省进入紧急备战状态。

八月二十三日起，中共猛烈炮击大小金门，迄十月六日，共发射炮弹四十四万四千四百三十二发。

二 事略

先生续任教新亚书院，并负责院务和所务。

三 著述

二月，《中国文化与科学》，刊于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新生报》、《幼狮杂志》七卷二期。收入联经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四十三册《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》，二〇〇一年素书楼文教基金会·兰台出版社整理新版印行。页二六二～二八四。摘要如下：

一

中国人并非没有科学智慧，抑且中国人在科学界亦有卓越成就，绝不逊于其它民族。中国文化亦非反科学，有使科学绝不能在中国文化里生长之内涵性质。西方现代科学，亦自最近三四百年来始产生。叙述西方科学史，固可远涉及于希腊及远古，但现代科学之正式产生，却是崭新的一事件。因此现代科学之开始产生于西欧，此乃一种历史机运，并

一九五八年
戊戌
六十四岁

不当涉及文化本质问题。

二

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，在中国获得其理想发展之后，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冲突？当从两方面讨论：（一）就物质方面言。近人常说，西方是物质文明，东方是精神文明。此一分辨，实不恰当。当知科学便是一种精神事件，我们绝不当从纯物质方面的观点来看科学，而且精神与物质，亦难严格为开。有物质便寓有精神，而且精神亦必在物质上表现。中国传统一向亦并不忽视物质生活，中国古人常以“衣冠文物”夸示其文化之优异，可见中国人一向亦以物质进展来代表文化之进展。《易经》言“开物成务”。《左传》言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，求厚生必先知利用物质。求能利用物质，必先懂得正德。《中庸》“尽人之性”、“尽物之性”，皆正德也。尽人之性，又能尽物之性，乃始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与天地参。这即是“人工”与“天德”之合一。

（二）就精神方面言。中国人一向重视现实与应用，亦可说重视事实与证验。此一点，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。中国人一向所重，乃在道德与教育。道德乃是一种人类之躬行实践。《论语》说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离了人生实践、道德便不存在。中国人只是实事求是，在躬行实践中求体悟有得，此是中国文化精神。

其次，中国思想极重天人合一。因人类处于大自然之中，人类一切行动事为，不能不顾及大自然，亦不能不与大自然期求一和会合一之道。此即中国人之所谓“天人合一”。但中国人之所谓“天”，每主即于人以见天，因人自天来，故天即在人身上表现。除人外，尚有物。物亦自天来，故中国人又主即于物以见天。孟子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。”此语最道出了中国人心中“天”字之真体段与真意义。中国人心中之天，乃是一最高不可知境界，而实隐隐作为此一切现实可知界之最后主宰。一切现实界种种事象，或由人道起，或由物理生，此皆可知；而除此之外，尚有不为人类知识所能知者，中国乃谓此为“天意”或“天命”。在目前科学知识之最高限度外，仍有一不可知境界，此正与中国人思想中之所谓“天”相近。由此言之，又安得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与西方现

代科学精神相冲突而不能并存乎？

三

窃谓科学任务应可分为三方面：（一）格天。（二）格物。（三）格心。西方现代科学，于“格物”方面成绩卓著，但在“格心”方面，则似尚有缺。中国文化传统，于此方面，能直接注意到实际的活的人心，其成就似较西方现代心理学远为超越。中国人自有一套心理学，即所特有的一种“心性之学”。中国的此种心性之学，仍是注重在躬行实践与历久观察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关于人伦道德、政治社会一切理想与措施，乃悉以其所认识之心性之学作基础。亦可谓中国之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即以其心性之学为中心。而此种心性之学，则实具有现代之科学精神者。

再次言“格天”之学。此项学问，应由格心、格物之学两面凑合而逼近之。西方现代科学，本由天文学开始，而转入物理学。照中国人意见，物亦是天，则格物越深，亦即对天之认识益深。故格天之学，必有赖于格物与格心；而格心之学，则有赖于治史。而此天与物与心与史四者之融凝合一之一极大理想，则只在中国思想中早有存在。故西方现代科学，实乃对中国传统理想有充实恢宏之作用。而西方现代科学之传入中国，专就精神方面言，必具如此认识，乃可以别开生面，更有进展也。

四

孔子有言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故人类知识最正当与最可贵之处，正在其同时知有所不知。知与不知之谨严分别，此亦科学精神之主要一项目，而同时为中国传统精神之所重。然人类所不知者，实远超过于人类之所知。因此科学家首先当谨守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之明训，同时则于其科学范围之专门探讨之外，必具有一番人文修养。而人文修养则必可相通共认。如是，始可于同一文化中有相悦而解之乐，亦可于各自探求中，有百川汇海之效。

三月，《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》，刊于香港《人生杂志》十五卷九期。台北《幼狮学报》一卷一期重载。收入联经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四十

五册《中国文学论丛》。二〇〇一年又收入素书楼文教基金会·兰台出版社《中国文学论丛》。编按：本篇要义略同于一九四二年《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》，已加摘要，兹略。

九月，《孔道要旨》，刊于《新亚生活》一卷十期。收入联经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五十册。《新亚遗箴》，页一七一～一八一。摘要如下：

孔子在中国，一向被尊为“至圣先师”。孔子之伟大处，正在教我们以人道，即人与人相处之道，即教我们如何立身处世，在社会上做一人。孔子的教训，以道德始，也以道德终。孔子所讲的道德，却并无甚深玄义，人人能懂、能说、能做。也许有人要问：孔子所讲已是旧道德，能否继续应用在今天？我们且看，曾子说的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怎样叫作“忠”？忠就是自尽己心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，都该尽我十分之十的心，若仅用到七八分，那就是于己心有不尽，那便是不忠。这样说来，又有什么新旧之分呢？何谓“恕”？恕是推己及人，若别人对我如此，我会不高兴，我为何可以如此对人呢？

孔子又常讲“孝”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一般人批评孝是封建的，有阶级性的。但如果我们自己做了父母，又盼子女如何呢？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却早已是孝道了。因此孔子所讲的道德，只是普通人共有的一种内心之觉。你自己总不喜欢别人对你不忠不信，你自不该以不忠不信对人。可见讲忠信，便是讲恕道。孟子是很推敬曾子的，他在忠恕以外，又提出了两个字：曰“爱”、曰“敬”。人谁不喜欢人家爱、人家敬？所以我也该爱人、敬人。孟子曰：“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”一个人若能得到大家的爱、敬，岂不就是人生最高幸福吗？

我们今天听到孔子的话，若我们今天就去做，那今天便是一有道德的人。明天亦然。天天如此做，便是下学而上达，可以直上达“天德”。孔子之道，若从简易平直处讲：在古代是孟子，后代是阳明。若从复杂周备处讲：在古代是荀子，后代是朱子。孔子只是从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。孔子之道，还是在人身上，在人心中。但孔子之道，正贵人由身由心去实践。孔子之道，必要配上活的人，才见其为道的。

八月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印行。一九七一年台湾初版发行由三民书局总经销。一九七八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据原版影印刊行。收入一九九八年台北联经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八册。摘要如下：

自序

本书共收文四篇：

- 一、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
- 二、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
- 三、《孔子与春秋》
- 四、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

清儒治学，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。其先则争朱、王，其后则争汉、宋。其于汉人，先则争郑玄、王肃，次复争西汉、东汉，而今、古文之分疆，乃由此而起。其治今文经学者，其先则争《左氏》与《公羊》，其次复争《三家》与《毛》、《郑》。其于推寻家法，絀绎坠绪，未为无功。而随之愈幽，凿之益深，流遁而忘反，遂谓前汉古文诸经，尽出刘歆伪造，此则断断必无之事也。本书第一篇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即对此而发。

清季今文学大师凡两人，曰廖季平与康有为。康著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专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，而廖季平的《今古学考》，剔抉益细，谓前汉今文经学十四博士，家法相传，道一风同，其与古文分野，已远起于先秦战国间，而夷考汉博士家法，事实后起，迟在宣帝之世。及其枝分脉散，漫失统纪，歧途亡羊，无所归宿。不仅无当于先秦之家言，抑且复异于景、武之先师。两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，可资证明。本书第二篇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，则为此而作也。夫治经学者，则岂有不读《儒林传》？而终至于昧失本真而不知，此即是门户之见之为害也。

然一时代之学术，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，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，而莫能自外。逮于时代变，需要衰，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。若就此寻之，汉儒治经学，不仅今文诸师，同随此潮流，同抱此

精神，即古文诸师，亦莫不与此潮流精神相应相和，乃始共同形成其为一时代之学术焉。清儒晚出于两千载之后，其所处时代，已与汉大异，清儒虽自号其学为“汉学”，此亦一门户之号召而已，其于汉学精神，实少发见。本书第三篇《孔子与春秋》，特于古今经学流变之大体，以及经学与儒家言之离合异同，提絜纲领，穷竟源委，于学术与时代相配合相呼应之处，独加注意，而汉儒与清学之辨，亦朗若列眉，更无遁形。读者必于此有悟，乃可以见清学之所建立，乃所以独自成其为清学，而未必即有当于汉儒之真相也。

清儒主张今文经学者，群斥古文诸经为伪书，尤要者则为《周官》与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远有渊源，其书大部分应属春秋时代之真实史料，此无可疑者。惟《周官》之为晚出伪书，则远自汉、宋，已多疑辨。然其书果起何代，果与所谓古文经学者具何关系，此终不可以不论。本书第四篇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，即为此而发。然貌若辨伪，而旨切存真，而于后代经师，考礼纷纭，种种误失，其症结所在，亦藉此可见。

本书宗旨，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，凡诸门户，通为一家。经学上之问题，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，自春秋以下，历战国，经秦汉，全据历史记载，就于史学立场，而为经学显真是。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，而另辟途径，别开户牖，此则本书之所由异夫前人也。

夫治经终不能不通史，即清儒主张今文经学，龚定庵、魏默深为先起大师，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。而康长素、廖季平，其所持论，益侵入历史范围。故旁通于史以治经，筌路蓝缕启山林者，其功绩正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。惟其先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，遂使流弊所及，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。凡所以不合于其所欲建立之门户者，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。于是不仅群经有伪，而诸史亦有伪。挽近世疑古辨伪之风，则胥自此启之。夫史书亦何尝无伪？然苟非通识达见，先有以广其心、沉其智，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，而轻追时尚，肆于疑古辨伪，专以蹈隙发覆、标新立异为自表曝之资，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，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？

本书之所用心，则不在乎排挤清儒说经之非，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

术之真相。亦惟真相显，而后伪说可以息，浮辨可以止。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，则实不尽于为经学上之今古文问题持平论、作调人，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原抉微、钩沉阐晦之一得。读吾书者，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，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。

一 刘向歆父子年谱

（摘要见一九三〇年，兹略。）

二 两汉博士家法考

（摘要见一九四一年，兹略。）

三 孔子与春秋

（摘要见一九五四年，兹略。）

四 周官著作时代考

（摘要见一九三二年，兹略。）

当代学者对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的评论

孙国栋教授在从《钱宾四先生的经学观念看中国社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》中说：“钱先生对经学有几点观念：第一、经学所重在能开一代王制。第二、钱先生认为孔子《春秋》是一部亦经、亦史、亦子的书。第三、西汉经学以公羊学家为主流。第四、钱先生认为东汉虽重经学，但学者治经，已渐忘失了西汉公羊学家开一代王制的精神，只是注意几本旧经典，守着章句家法以牟利录，于是经学变得极为繁琐。第五、钱先生认为先秦平民学术诸子是面对政治，与王官学相对。第六、魏晋政府既缺乏开一代王制与民更始的精神，学术上也无王官学与平民学相对的现象。从上面几点，可见钱先生认为经学不是只钻研几本周代的典籍，必要更进一步了解西汉经学家的精神——认识社会在不断演进，应该不断尊进社会新兴的家言，吸取社会学术思想，会通传统经籍，赋予政府精神上的新血液、新活力，涤荡旧官司掌故，改进制度，以创一新代”。（见台北市立图书馆《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》年刊第三期。另见二〇〇三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《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》，页一九

八月,《学籀》一书,初版自印于香港。收入联经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二十四册。二〇〇一年素书楼文教基金会·兰台出版社整理新版印行。摘要如下:

序目

……自念少孤失学,年十八,即抗颜为人师。蛰居穷乡,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。常以晨昏,私窥古人陈编。既无师友指点,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。冥索逾十载,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,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。然仅以存之胸怀间,亦未敢轻有所论述也。嗣后稍有撰着,而终不敢轻谈门径方法。良以人之为学,才性既不同,机缘复互异,从人之道,难可一致。自审所窥有限,岂宜妄有主张,转滋貽误。顷年逾六十,少壮所志,十不偿一;精力就衰,殆不能更有所深涉,而厕身师席,亦垂五十寒暑矣。平生微尚,所拳拳服膺,自以谓是者,举以告人,义亦宜然。古人云:“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“观于海者难为水。”“取法乎上,仅得其中。取法乎中,仅得其下。”本书前两篇述孔学之大体,第三、四篇述朱子读书法。尼山、考亭,学之山海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管窥蠡测,所不敢辞。第五篇时近俗类,堪资借镜。末篇乃当身感触,私所抱负,亦以附焉。倘有好学之士,取而为法,亦为学入门之一途也。因名之曰《学籀》云尔。

一 略论孔子学大体(略)

二 朱子读书法

……今人读书,只顾要自己发意见。朱子教人读书,只重在教人长趣味。此是莫大分歧点。朱子以最钝滞法教人,实乃是最快捷,最聪明之法。

读书不贵多,只贵熟。少看熟读,不要钻研立说。但要反复体

玩，埋头理会，不要求效。

所谓“兼看”，谓方读一书，旁及他书，同时兼读也。当知兼读已读书，实有受用。兼读未读书，只是分心。心分了，便不易有受用。故每逢读一新书，决当全神一志读。只可兼读旧书，万不当同时又兼读另一新书。

读书须看上下文义。不可泥着一字。扬子“于仁也柔，于义也刚”，到《易》中又将刚配仁，柔配义。《论语》：“学不厌，智也。教不倦，仁也。”到《中庸》谓：“成己，仁也。成物，智也。”此等处，须各随本文意看，便自不相碍。

近代学者，未读宋儒书，便谓宋儒只讲义理，不务考据。又谓宋儒所讲义理，只凭主观，不求客观。此正如判人作贼，却不全戡其赃罪情节也。……如云：“莫让人牵着鼻子走”，“莫轻信前人”，“须自出手眼”之类。读书生疑，仍自虚心熟读白直晓会来。……而近人却多犯了高心空腹，游谈无根之病。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、中国思想，其实多是空洞，不凭考据，自发议论，其病远超宋儒之上。

三 朱子与校勘学

朱子旷代巨儒，其学所涉，博大精深，古今无匹俦。以理学名高，其余遂为所掩。即其诗文，亦巍然一世宗匠。其整理文学古籍，平生有三书。四十四岁成《诗集传》，六十八岁成《韩文考异》，七十岁成《楚辞集注》。即就文学史范围言，三书成绩，已可卓然不朽。……朱子《韩文考异》成于晚年，学诣既邃，偶出绪余，莫非精圆绝伦。虽若仅为校勘之末务，而训释之精，考据之密，清儒能事，此书实已兼备。本篇特就校勘一事粗为简述，指示大例。庶尊宋学者，勿鄙此为玩物丧志，谓为不足屑怀。尚汉学者，亦破其壁垒，辟其户牖，扩心胸而泯声气。知训诂考订校勘之业，亦复别有本源。凡其所得之浅深高下，将胥视其本原以为定。于以通汉、宋之囿，祛义理、考据门户之蔽，而兼通并包，

一以贯之。

……“监本未必是，建本未必非。”“汉学不必不非，宋版不必不误。”“宋本亦多沿旧，无以胜今本。”此治校勘学者所不可不知之最先第一义，而朱子固先发之矣。……顾炎武《音论》，自言据《诗经》通古音之方法，曰：“列本证、旁证二条。本证者，诗自相证也。旁证者，采之他书也。二者俱无，则宛转以审其音，参伍以谐其韵。”可见考据之学，亦必有越出于证据之外者。朱子考异所重，则尤重在《韩集》本文之内证，所谓“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”是也。文理者，字法、句法、章法皆是。就韩氏所自言，则曰“陈言务去”，又曰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。……校勘之学，固贵于客观之取材，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。……清儒戴震有言：“学有三难。淹博难，识断难，精审难。”……王念孙校《淮南王书》，曾谓：“典籍之误，半由传写误脱，半由凭意妄改。”

四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

每一时代的学者，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。循此推寻，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，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、路向和风气之不同，亦可借此窥见。本篇为便初学，远的不说，专取其“近己而俗变相类”者，粗述百年来，而自陈澧始。

（一）陈澧

这是陈氏自述因于时代转变而影响他走上学术转变之大概。陈氏在当时，受了干嘉汉学考据极深的洗礼，正当考据学全盛时，他能首先觉其锢蔽，要努力来创造一种学术的新途辙，陈氏实不愧是近百年来提倡新的读书运动之第一人。

陈氏要从“善言义理”这一点上来沟通汉、宋之门户，而以“有益于身”与“有利于世”语，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，可谓对症下药。故陈氏又谓：

经学无关于世道，则经学甚轻。谓有关于世道，则世道衰乱如此，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。盖百年以来，讲经学者，训释甚精，考据甚博，而绝不发明义理，以惊觉世人，此世道所以衰乱。

又说：

今人只讲训诂考据，而不求义理，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，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，与不读书者等。此风气急宜挽回。

近人尚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之不二法门者，其实若专从训诂考据之见地来读书，其间流弊煞是不少。他们训诂考据之所得，并不说是错了，只是于身无益，于世无用。……“士大夫”则须从读书中明义理，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。

学者之病，在懒而躁，不肯读一部书。此病能使天下乱。

……懒是不肯平心静气，精详阅读。躁是急于成名，好出锋头，掩盖前贤，凌驾古人。

清代干嘉经学，极盛之后，正犯了这个毛病。而况他们还避免不掉一种懒而躁的心理，在不合理的读书风气下，还会制造出种种牵连而生的病态。陈澧可算是在这种空气里面首先有觉悟到的，在他四十九岁刻成《汉儒通义》，以后他便积极干他新理想的读书工作，直到他七十三岁卒年，前后二十余年，积成了他毕生伟大的巨作《东塾读书记》。

《东塾读书记》与干嘉经学专务训诂考据的许多著作对看，也确实是远胜了。即如刘台拱的《论语骈枝》，为当时学者所推尊，若以较之《东塾读书记》中《论语》之一卷，其间高下得失自显。一则专从难解难考处着想，从大义大体上用心，即面目便自不同。然而陈澧在当时，他自身感受经学的影响，实亦太深了。所以陈氏的《读书记》，虽则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，而《日知录》内容，分经术、治道、博闻三类，《读书记》则只能自限于经术之一途。由我们今天来平心衡论陈氏学业上之成就，也仍只可算他是一个经学家，这是极显然的。而且陈氏治经，先劝人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，他说：

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。

然而在陈氏当时，内忧外患相逼而来，人人有不可终日之想，究竟已非细心静气来从头到尾读注疏的时代了。即使人人再能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，人人由此养到心性静细的地位，也不见得对社会有何真用处。因此，陈氏的读书主张，只算是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，但他自己所开的药方，却不见有力量，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。况且《读书记》又是一部太过谨严的书，温和有余，峻厉不足。只是弦有余音，引而不发，不足以发聋震聩。所以陈氏身后，还不见有一个面目一新的读书风气，而仍还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一进一退，在干嘉经学训诂考据的积习下讨生活。换辞言之，陈氏在学术思想史上还不够做成一个画界线的人物。

正因近百年来第一个有志开读者新风气的学者，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鲜明的旗帜，很清楚的路线，来领导后生学者向一新方向进行，所以直到如今，陈氏所说当时学术界的种种病痛，也多还未能洗涤净尽。做学问的仍多只为寻题目作文而读书，以作文为名士招牌之余习，依然存在。也未见大家肯细心来读一部书，从头到尾心性静细来读，也还只是随手翻阅，随意驳难。距离“博学知服”的风气，似乎还尚远。学者的心地，不仅全要掩盖先贤，即在并世师友，亦多轻心凌驾。说到此层，则似乎更不如干嘉当时。学者骄矜之气，似乎比前益甚。只听说“我爱吾师，我更爱真理”，究竟真识得真理者未必多，而尊师服善之心，则全为其重道爱真理之一句堂皇话头所牺牲了。大体上，陈澧所谓“懒与躁”的心病，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们的身里。而世道衰乱，我们学术界也还不得不负相当的责任。

（二）曾国藩

治近百年史的，论到人物方面，无论如何，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国藩。曾氏气魄之雄厚，人格之伟大，及其在政治上、社会上种种之建立，其不可磨灭处，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，到底也不能不承认。至论学术，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。述说近百年来之诸儒读书论，曾氏是极可注意的一人。

曾氏湖南湘乡人，生嘉庆十六年，后陈澧一年。卒同治一年，先陈

澧十年。曾、陈是同时代的人物。曾氏读书，生平力主一“耐”字诀，一“恒”字诀。他说：“一书未完，断断不读别书。”陈氏常提倡“士大夫之学”，说：“士大夫之学，略观大义，有益于身，有用于世。”曾氏做学问，却恰恰是走的这条路。

曾氏在当时，亦曾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，散见于其有名的《家书》，《家训》、《日记》、及《文集》中。当时的曾氏，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检讨，国史的协修，在三十一、二岁的年龄，才开始点读前后《两汉书》。这一点，使我们感到读书运动的对象，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，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；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，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缙绅士大夫，尤其应该是我们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呀！至少他们都应该“稍事学问”，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。否则青年们纵是努力读书，若将来涉足社会，便可不学无术，另以一种快捷方式高翔，那岂不是任何学术全成了八股？此其一。

在这宦海纷纭，乃至戎马倥偬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曾氏却建立了他学业上卓绝的成就。这一点，又使我们感觉到，读书并不一定要有一种特殊的环境，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，而实为社会一般人大家所能从事的。至于达官阔人，政军大僚，以及社会上各色各行的领导人，他们已然负担着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，那么他们更该“稍事学问”，奉曾氏为模范。此其二。

至论曾氏学问、事业，何以能互相辉映，而各有其卓绝的成就，一面固是由于其意志之坚毅，生活之严整；而另一面，则在其眼光之远大，与方法之切实。……曾氏用“约”字诀读书，屡见其《家书》、《家训》中。如云：

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。读经有一“耐”字诀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。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。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。读史之法，莫妙于设身处地。但记一人，则恍如接其人。但记一事，则恍如亲其事。经则穷理，史以考事，舍此二者，更别无学矣。经则专守一经，史则专熟一代，读经史则专主义理，此皆守约之道，确乎不可易。读经读史读专集，讲义理之学，此有

志者万不可易者也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

他以后教人“耐”字诀，“恒”字诀，“拙”字诀，“诚”字诀，以及“扎硬寨，打死仗”的口号，凡曾氏功业上的成就，和其从事学问的精神，处处呼吸相通，沆瀣一气。

读书既主守约，则选择不可不审。所以他说：

买书不可不多，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。余于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外，最好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庄子》、韩文四种，好之十余年，惜不能熟读精考。又好《通鉴》、《文选》及姚惜抱所选之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余所选《十八家诗钞》四种，共不过十余种。

读书能选择，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。而选择的标准，应该“先务乎其大”。他说：

书籍之浩浩，著述者之众，若江海然，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，要在慎择焉而已。

曾氏曾从唐镜海闻义理，又私淑于姚姬传学古语法，而曾氏之言义理文章，其识解意境，也均超出于唐、姚二人之上。曾氏与唐、姚之异点，也正在唐、姚空疏，而曾则博大。可见曾氏为学，实能抉破干嘉以来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派之藩篱，而求能从大处着眼，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。他的《圣哲画像记》，平心论之，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，与其指示学术途径，确已越出江藩、陈澧之上。

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。似乎领导学术者，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，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。因为有此趋向，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，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，而形成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。一个有志读书的青年，他们的最要条件，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，浩博的图书馆，完备的研究所。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，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。若我们放大眼光，为一般社会着想，便见

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。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，为少数人所专攻；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，为社会多数知识分子所应理解。

惟专就曾氏个人论，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，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。曾氏对此，亦屡屡自己说过。他说：

惟古文各体诗，自觉有进境。将来此事当有成，惟恨当世无韩愈，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。

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，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的年龄了。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：

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屈子》、《庄子》、杜诗、韩文。

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宝贵的意见，即在劝人读专集，而不要读选本。他说：

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。……学诗须先看一家集，不要东翻西阅。

又说：

学诗无别法，但须看一家之专集，不可读选本，以汨没性灵。

曾氏研攻诗文，最爱韩愈、王安石，盖取其雄直之性趣，倔强之格调，与己相近也。盖雄直倔强，曾氏性格之所长；恬憺闲适，曾氏性格之所短。曾氏研攻诗文，着眼在此两点上，切就已身，释回增美。纵使不以诗文名家，而此种研习方法，对于自己性灵修养上，也会有绝大益处。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。